

张石川

从影史

刘思平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刘思平 著

张石川从影史

中国电影出版社

二〇〇〇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石川从影史/刘思平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0.5

ISBN 7-106-01598-9

I. 张… II. 刘… III. 张石川(1890~1953)-生平事迹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1250 号

- 书 名 张石川从影史
作 者 刘思平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200000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6-01598-9/J·0725
定 价 22.00 元

内 容 说 明

张石川(1890~1953)系中国电影拓荒者。他集编剧、导演、制片人与投资人于一身,是中国早期电影著名企业家和艺术家、民营商业电影先驱,毕生拍片 150 余部(集),无论从哪一方面言,都理应在中国电影史占有一席之地。但对其研究专著,长期阙如。本书不仅填补了这一重大空白,以其翔实的史料、全面系统的叙述,介绍了张石川毕生从影历史,为张石川研究作了可贵的基奠;且勾勒出 20~50 年代初中国电影概貌,以及影人名人轶事。

全书行文朴实恰切,颇具知识性、可读性。不惟影视工作者可从中取得借鉴,广大读者亦可获得裨益。

不该忽视,更不能忘却

——序《张石川从影史》

陈 墨

刘思平先生完成了他的中国电影史研究专著《张石川从影史》,蒙他抬爱,要我为之作序。作为一个晚生后辈,对此虽感荣幸,却不敢贸然应承;劝他找前辈名流、知名学者为之序,这样可以使他的书增加亮点,与其大作相映生辉。

可是数月过后,该书的序言仍尚无着落。原因是,刘思平先生所求的学者名流,或是工作忙碌、时间紧张;或是闲云野鹤、身心散淡;或是有心助阵、却体力不支;总之是一时难以落实。其中是不是有个别名家高人对《张石川从影史》这一题目有某种过分的敏感、或习惯性的避嫌?则不得而知,因而不敢妄言。

这一我曾不敢应承的重任转了一圈还是落到了我的头上,我想这是因为我与思平先生及其大著实在有缘。

—

中国电影史研究界忽视、甚至忘却张石川久矣。

然而无论如何，一部中国电影史，对张石川这样一个人物，都是不该忽视、更不能忘却的。

作为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中国最早的短故事片《难夫难妻》(1913)的导演；作为中国最早的电影制片公司(1913年新民公司、1916年幻仙影片公司)的创办人、中国电影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电影制片公司——明星影业公司——的创办人兼经理人；作为30余部(集)电影的编剧、150余部(集)电影的导演；作为《难夫难妻》、《黑籍冤魂》、《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歌女红牡丹》、《脂粉市场》、《空谷兰》等等一系列中国电影史上的优秀经典作品的作者、《玉梨魂》、《山东马永贞》、《火烧红莲寺》(1~18集)、《杨乃武》、《西厢记》、《夜深沉》、《解语花》、《三笑》、《金粉世家》等等一系列创出中国娱乐电影类型及其票房奇迹的商业电影的生产制造者；作为中国电影历史的早期开拓者、中国民营商业电影的长期从业者和做出突出贡献者，无论从哪方面说，张石川都不应该是一位被轻易忽视的人物。

然而，事实却是，在我们的电影史研究界，张石川其人长期以来都是被忽视、甚至被忘却了的。与他的创业伙伴、事业搭档、中国电影的另一位早期开拓者郑正秋先生相比，张石川的历史命运实在令人感慨唏嘘。抑张(石川)而扬郑(正秋)，不仅成为一种“历史定评”，成为许多后学者的“历史共识”；甚至许多人只知有郑(正秋)而不知有张(石川)，只言郑、而不言张！

之所以如此，只不过是，张石川在其苦心经营的明星公司(总厂)于1937年被入侵的日寇占领、继而被毁之后，曾经在上海沦陷期间有过一段在日伪电影公司艰难求生的经

历;因为张石川是明星公司的老板、是企业家、资本家;因为张石川一向以电影商业为重、喜拍商业电影、注重电影的娱乐本性;因为张石川虽然曾经支持过左翼电影、但与左翼电影及其左翼电影人不是一条轨上跑的车。

这种由狭隘的政治观念决定文化选择和学术模式的状况,以及这种庸俗不堪的功利主义学术观念本身,都早就该彻底改变了。

我的意思,不仅仅是说,因为现在中国电影重新面临产业、企业、商业等等现实及其观念的困境,才来“重新理解”或“重新评价”张石川及其明星影业公司,由此得到功利的借鉴;而且要说,应该把对电影历史的学术研究与对某个人或某类人的(政治上的)“平反”及其“功业宣传”区别开来。对某一个人、某一种历史现象作学术研究,决不能再简单的等同于为之“树碑立传”;学术的研究,决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功利的“宣传”。

电影史研究中,对某个人、某种现象、某段历史的评价恰当与否,这是一个问题;而因为某种评价,而限制、甚至阻止对一个人、一种现象、一段历史做出学术上的研究,则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们所应得的教训,不仅仅是评价方法或评价体系上的失当,而是以“评价”当“封条”、以“审判”当“求证”的可怕的(非学术的)“学术”观念。

对张石川其人做何评价,大可以展开研究、分析、争论;可怕的是,我们往往会因为张石川是一个“问题人物”而对其“避之则吉”,从而对他根本就不再作任何学术上的研究和分析,进而忽视其存在,进而忘却其历史。

二

现在,我们再来看刘思平先生的专著《张石川从影史》。

首先,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部填补中国电影史研究空白的著作。

张石川研究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无论如何都是中国电影研究界的一种尴尬。尤其是在此世纪之交,该当回首已逝百年,总结经验教训,对历史有所交待之际,这一空白的填补,不仅是刘思平先生本人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也为所有电影研究的同行了却了一项心头遗憾。由此,我不仅要在此恭贺他的这部书的出版,同时也要对他的辛勤诚恳的精神劳作表示充分的敬意!

进而,作为张石川研究的填补空白之作,刘思平先生以“从影史”为题目,把他对这位电影历史开拓者的敬意和评价——其中当然少不了对张石川的“平反”的论述以及“重评”的呼吁和努力——涵藏在对张石川其人的从影经历的历史探究和描述之中。这当然是作者作为电影史研究者的本分,但作者从“写史”与“求证(据)”开始,并以“求是”为写作目标,对以往的“以论代史”和“以识代是”的不良传统的纠偏反正,其意义决不能低估。

无论如何,历史之“是”总是不可改变、也不会改变的,而对此种不可改变的历史的“是非”评价,则往往“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求“是”之可贵,不论可知。证之以《张石川从影史》一书,虽然我们能够明显地在书中看到作者对张石川其人浓厚的兴趣和好感,但作者并没有因为自己对其传主的这种好

感以及敬意,而去大搞过去常见的那种一时“东风压倒西风”、一时又“西风压倒东风”的一边倒的“重评”。此书的写法,不是、或不仅仅是“把被历史颠倒的再颠倒过来”那么简单,而是力图把被历史忽视的、以及被人们忘却的东西挖掘出来、展现出来。对张石川其人,并未一味评功摆好,而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尽可能地让事实“说话”,尽可能地求得历史之“是”。所以,《张石川从影史》当是“信史”。

再次,如其标题所示,此书不是一部张石川的全面的人生历史传记,而只是他的“从影史”,只涉及与电影有关的重要事迹。也就是说,还只是全面的“张石川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仅是如此,我知道,刘思平先生已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写作此文之际,我还能回忆起他在资料室翻阅当年旧杂志、旧报纸的情形;在缩微胶片室中长时间地查阅资料的辛苦,凡有此经历者俱能体会,不必多言。——需要多说一句的是,他在北京各图书馆查阅有关张石川以及当年电影史资料,由于许多珍贵报刊纸质薄脆、不能复印,刘先生只好在图书馆手抄资料数万字,以至于感动图书管理人员。尤其宝贵的是,作者还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去“发掘活资料”,他对张石川先生的女婿兼重要的事业助手何兆璋先生——他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电影家——的长时间、高密度的通讯采访,积累了大量极为宝贵的关于张石川的电影史资料;此一资料来源,相信绝对是独此一家。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醒我们,对中国电影史、尤其是早期中国电影史的资料“抢救”工作,真的要“只争朝夕”才是!

此书不仅资料丰富而且翔实,还有一个优点,是明白简

洁、通俗易懂。无论是学术圈内、圈外，还是电影圈内、圈外的读者，相信都能在此书中有所获益。

当然，对某些学者来说，通俗易懂或许是一个优点，或许也是一个缺点——那就是“不够学术”。换言之，对某些学者而言，或许会觉得此书的“理论深度”尚有所欠缺。有所“欠缺”的原因很多，研究及写作的题目所限是其原因之一，已有资料、尤其是研究资料的空白当然也是其原因之一——你不能指望在平地上直接盖起高楼的顶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知道，是作者的“小心保守”——此书中不仅有些观点没有展开，且有不少资料也没有全部发表。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中的第一部书，我们没有理由过于求全责备。毫无疑问，张石川研究还仅仅是开始，《张石川从影史》也只不过是“从影史”而已，将来一定还会有——也应该有——《张石川传》、《张石川评传》、《张石川电影创作观念研究》及《张石川电影经营思想研究》等等研究专著出现。相信刘思平先生的这部开拓性的《张石川从影史》，对未来所有的张石川研究，都会有其借鉴价值，这就足够了。

作为《张石川从影史》的最早的读者之一，我乐意在此向广大读者推荐此书。

三

我与刘思平先生有缘相识，相交忘年，是人生的一大快慰。作为晚生后辈，我本应称他为刘老师，但他向来幽默开朗，生具赤子之心，平等待人，是老少咸宜的朋友，所以同事中诸多晚辈如我者，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刘”。

有一件事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那就是我的岳母患脑溢血住院,需要转院手术,思平先生不仅主动帮忙找到了名医,而且在手术的当天特地赶到离他家数十公里之外的医院、在手术室外陪了我整整6个小时。那天小雨夹雪,春寒料峭,然而每当忆及老刘盛情厚谊,常常让我热泪盈眶。仅此一斑,当足见刘思平先生难得的好品质与真性情。

本书出版之时,刘先生就要退休了,这实在令人心中怅惘。好在他身心俱健,且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60岁又将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不老的老刘仍会有长长的光明未来。我写此文,不仅仅想以此纪念我们曾有过的一段美好的过去,也想以此祝福他更加美好的未来!

1999年10月16日于北京

目 录

不该忽视,更不能忘却

序《张石川从影史》..... 陈 墨(1)

动荡时代.....	(1)
初涉影坛.....	(6)
循序渐进.....	(14)
《黑籍冤魂》.....	(20)
彷徨生路.....	(27)
“明星”升起.....	(31)
方针抉择.....	(36)
“孤儿救祖”.....	(42)
一石激浪.....	(50)
波浪起伏.....	(69)
火红年代.....	(79)
影海情谊.....	(89)
有声仙境.....	(95)
跌入低谷.....	(103)

2 张石川从影史

抗日烽火·····	(108)
左翼加盟·····	(112)
崭新历程·····	(121)
赣南保友·····	(130)
劈波斩浪·····	(135)
喜忧参半·····	(146)
痛失良友·····	(153)
革新图强·····	(157)
“明星”陨落·····	(165)
“孤岛”奋争·····	(175)
“老板”马仔·····	(189)
铁蹄求生·····	(200)
战后磨难·····	(210)
新生遗憾·····	(217)

后 记·····	(222)
-------------	-------

附录:

张石川年表·····	(228)
------------	-------

张石川所著文章

自我导演以来·····	(236)
传声筒里·····	(249)
哭正秋老哥·····	(252)
重摄《空谷兰》经过·····	(254)
革新之话·····	(256)
转瞬一年·····	(257)

动荡时代

清光绪十六年,即公元1890年1月1日,在浙江宁波市一户蚕茧商人张和巨的家里,一个男孩呱呱落地,全家为长子的诞生而欣喜万分,他就是日后成为中国电影事业开拓者的张石川。

张石川出生时,正值大清王朝的末日。由于满清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人民生活痛不欲生,帝国主义横行霸道,国土满目疮痍。1894年,张石川四岁时,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甲午战争。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纷纷创办了《中外纪闻》、《时务报》等报刊杂志,要求改革维新的呼声日益高涨,后来兴起的戊戌变法被残酷无情的慈禧镇压了。随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黄兴、宋教仁、蔡元培等人组织起“华兴会”、“光复会”等在全国开展了革命斗争。

张石川,原名张伟通,字蚀川。从小聪颖好学,活泼好动。由于是长子而备受父母疼爱,培养了好强争胜的性格。他有张伟涛,张巨川弟二人,妹一人。张石川的出生地——宁波,历来是培育师爷和大商人的宝地。所以他自幼除读私塾外,闲时帮助父亲张和巨料理商务,学会了务实的经商作风和管理才能。

不幸的是父亲张和巨于1905年病逝,家里生活更加困苦。张石川是个“其事母以至孝闻”^①的孝子,家中又有弱弟小妹,15岁的他不得不中断学业,随舅父经润三远离家乡赴上海谋生,以便养家糊口。

舅父经润三在上海是个极为有名的商人,给经营房地产的美国人当买办,并担任华洋公司的总经理。张石川随舅父到上海后,被安排在华洋公司任“小写”,即是抄写工作。为了家中生计,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在租界林立、外国人众多的上海生存,张石川不辞辛苦,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去夜校学习英文。经过刻苦的学习,他很快就掌握了英文,并能用较流利的口语与美国人交谈。消除了语言的障碍,使得他更加得心应手地在洋行与外国人打交道,同时也获得了外国人的重视和信任。因此,结交了很多朋友,得到了别人所得不到的知识。这为他今后开展电影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上海自被清政府将很多土地割让给各国侵略者成为租界后,大量的西方文化,资产阶级思想和势力,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像潮水般涌进。纺织厂、面粉厂、榨油厂、碾米厂等工厂的开工加速了上海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人、美国人投资创办,买办商人参加,由中国文人担任编辑的报纸《申报》、《新闻报》、《沪报》等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些报纸将满清王朝有关政事,市民的观点及对政局的不满都登载了出来,表现出以上海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运动正在兴起。政治思想的活跃,更加带动经济上的繁荣。被冠以“大上海”、“夜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的大上海成为了东方的巴黎。在这个环

① 郑正秋著《张石川小传》,原载《明星特刊》1933年第一卷第一期。

境下,极易接受新事物的张石川,自然对进步的资本主义思想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受到了重要的影响,对他以后的生活道路,事业的开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00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王钟声等人在日本读书期间,看了日本话剧演出,不但深受启迪,而且被这新的艺术形式所吸引,他们也组织了剧社,并参加了演出。回国后,王钟声在上海首创了中国的话剧,当时被称为“新剧”,或“文明戏”。他与马相伯、沈敦和在白克路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社“春阳社”,慨然以改良戏剧自命。新剧在上海的兴起,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兴趣,新剧剧社也就一一成立。张石川除了在华洋公司工作外,还在舅父办的新剧团体“立鸣社”任经理,组织管理当时方兴未艾的新剧演出,由于他肯于接受新的思想,加之聪颖过人,又有天生的组织、管理才干,不久即成为新剧运动的骨干,得到了人们的承认,以及舆论推崇。

为了大力开展新剧运动,保护各个新剧剧社的利益,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3月初五,新剧公会宣告成立,张石川参加了公会。5月,以张石川为发行人、杜俊初为创办人的《新剧杂志》公开出版发行。他们宣称要在新时代除旧布新,为新剧的发展提供舆论阵地。他们当时上演的新剧有《革命家庭》、《珍珠塔》等剧目。

就在此时,张石川认识了“新民剧社”的主办人郑正秋,俩人一见如故,常在一起促膝长谈。最后他们将“立鸣社”,“新民剧社”合并成“民鸣社”。郑鹧鸪(原名郑介诚)此时也加入了剧团。张石川主持前台,郑正秋主持后台,郑鹧鸪专任演员。他们将剧社搞得红红火火,在上海滩名噪一时。《金声日

报》的主笔周剑云,写了不少剧评,支持过他们。四人结成了莫逆之交,为他们以后创办“明星影片公司”奠定了坚实的友谊基础。

自 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 月 11 日,上海徐园的“又一村”在一些杂耍节目中,插空放映“西洋影戏”,大多是法国电影。美国电影商人雍松也于次年来到上海,在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放映美国电影。他们所放映的影片内容,大多是一些事物的片断和情景的纪录。众多的中国人被这新奇的东西所吸引,纷纷攘攘地看“西洋镜”。就这样电影正式传入了中国以后,外国人看中了我国广大的电影市场,络绎不绝地来到上海开办起电影放映业,并逐渐遍及全国,各国电影商人也展开竞争,互相争夺市场。西班牙人安·雷玛斯在上海海宁路乍浦路口租赁了一家旱冰场,用铁皮搭建了一个可容纳 250 名观众的电影院,名叫“虹口活动影戏院”。于 1908 年 12 月 22 日开幕,首映的是外国影片《龙巢》。1909 年在海宁路北四川路又修建了富丽堂皇并设有酒吧的“维多利亚影戏院”,还开办了“夏令配克影戏院”、“万国大戏院”、“卡德影戏院”、“中国影戏院”、“恩派亚影戏院”等。这不但活跃了上海的文化娱乐,而且使更多的中国人民受到了西方文化科技方面的影响。张石川本来就好学,好奇,好探索新鲜事物,又爱好戏剧艺术。他像很多中国人那样被活动的影戏所吸引,偶尔去这些影戏院看电影。

这期间,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事件,腐朽的清政府还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人民的不满,终于促使全国各地兴起推翻满清封建